

本期要目

- 学史琐谈 —— 林增平
艰难的历程 —— 杨第甫
程潜的青年时代 —— 沈文青
张治中在湖南 —— 余湛邦
戴笠的另一副面孔 —— 沈 醉
从柳宗元两首写渔翁的诗谈起 —— 羊春秋

青年文史

1

丛刊



青年文史

丛刊 1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青 年 文 史

第 一 集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责任编辑：徐日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 14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商业专科学校印版厂印刷

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1,000 印张：5.5 印数：1——3,200

统一书号：11109·367 定价：0.82元

丛刊 ①

目 录

▲史林漫笔

青年人需要学点近代史……………章开沅 (3)

学史琐谈……………林增平 (5)

▲伟人风范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的几个侧影……………穆明德 (8)

一个公民的幸福回忆……………夏建勋 (15)

▲青春的足迹

艰难的历程……………杨第甫 (19)

我终于站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刘双章 (40)

程潜的青年时代……………沈文青 (51)

我的一段小学教育……………雷琬敏 (64)

▲人物春秋

回忆我的祖父宋教仁……………宋奇璋 (68)

小凤仙其人……………陈旭麓 (71)

张治中在湖南……………余湛邦 (77)

我党的忠实朋友龙伯坚先生……………周 里 (91)

我尊敬的一位老师……………于 刚 (94)

——忆陈奎生先生

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前夕……………徐 盈 (99)

——回忆邓宝珊将军及其他

▲历史的钟声

东征忆语……………杨 仁 (106)

战时湖南儿童保育院历难记……………齐 新 (122)

▲访问记

访~~戴笠~~兴幼女黄德华……………高 原 (131)

▲耻辱柱上

戴笠的另一副面孔……………沈 醉 (134)

三湘巨擘陈光中……………吴松庚 (140)

▲诗文赏析

从柳宗元两首写渔翁的诗谈起……………羊春秋 (149)

诗中血泪多……………弘 征 (154)

——谈《于右任诗集》

乐天当日最多情……………李克和 (161)

——三篇女诗人作品小析

▲武林轶事

1932年湖南第二届国术比赛目击记……………彭学藩 (164)

▲政海轶闻

杨度入党秘闻……………秦 峥 (171)

青年人需要学点近代史

· 章开沅 ·

青年人需要学点中国近代史。

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中国的，怎样与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将封建主义作为它统治中国的支柱，使中国从一个封建主义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中国近代史的册页上，记录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布满着中国人民遭受内外反动派残酷压迫的斑斑血泪。经常温习这一段历史，可以使我们不致忘记过去，奋发图强，不容许往昔的悲剧在神州大地上重演。

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暴力压迫从来没有屈服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英勇反抗外来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的爱国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那些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那些光芒四射的辉煌业绩，永远激励我们前进。我们为自己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决不容许任何反动势力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决不容许我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丝毫损害。

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我们的先辈历来仇恨黑暗，憎恶愚昧，热爱光明，向往进步；闭关自守的封建藩篱，文化专制的精神桎梏，都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从帝国主义重炮打开广州门户之日起，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就放眼观察世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从早期开明人士热心考察和介绍西方，

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时期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到“五四”前后李大钊、毛泽东等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多少仁人志士为祖国走向近代，臻于富强而孜孜以求，不倦探索，乃至呕心沥血，英勇献身。温习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守旧势必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坚持不断革新，才能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无限的生机。

曲折坎坷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又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曾经有过不少的爱国人士和政治集团以各种不同的纲领、主义、方法来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所有这些反抗、斗争、革新、革命，统统都失败了，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抱终身之恨！只有当新兴的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了自己，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才得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不断取得了新的胜利。重温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懂得，胜利来之不易，后继者的责任更为繁重。我们要珍惜已有的胜利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解放前，我进入大学历史系，主要是对这

门学科感兴趣，并没有领悟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真谛。但因为既选择了

这一专业，就不能不经常和故纸堆打交道，从而在阅读古籍，使用工具书，整理和考订史事等方面，获得了若干知识和方法，为此后从事研究工作练就了一点浅易的基本功。

真正理解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意义，是在解放以后。从一九四九年春夏起，此后几年间，我的主课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使自己具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搞好这一主课的学习，首先当然是学好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认真、刻苦、反复地学好主要的马列主义原著所产生的效益，是每个学术工作者都能感受到的，我这里就不作赘述。其次，是有选择地阅读几本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著作或教材，这有助于使自己学到的理论条理

学史琐谈

·林增平·

化和系统化。再次，是选读几种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编写的历史书籍，也能获益不浅。我当年选读的是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前辈史学家的著述，读时也择要做些札记。无庸讳言，这些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不够完善之处，纪事立论也偶有失误。然而，在探索不同阶级社会性质，阐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剖析史事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上，毕竟作了开拓性的、向导性的工作，其先驱先路、嘉惠后学的作用，是应当承认的。我经过几年的主课学习，就为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我确定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是一九五三年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以后。

从那时起，每年都承担专科、本科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任务；每年都把讲义从头到尾校订、修改、充实、提高。经过四次轮回，这部讲义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五八年以《中国近代史》书名分上、下册出版。那时，我还不满三十五岁，有的同志以为我是秉承了家学渊源，或认为我的天分高，有夙慧。其实，我并非出自书香门第，父兄都是搞工程的，读初中一年级时，我还曾因为好几门功课不及格而当了留级生。我的诀窍是人们所熟知的那句话：“学海无涯勤是岸”。在那几年内，为把讲义编好，我一般地说得上是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在炎天三伏，午睡这个程序也是被我从日常生活里排斥出去了的，而且，还经常捐弃了文娱活动；开夜车是每日的例行功课。这也许不足为训。但话又得说回来，做学问，在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应当下点苦功夫的。

进入六十年代，临近四十岁，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收缩

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上。一九六一年，我应中华书局之约，写了一本《辛亥革命》小册子，编入“知识丛书”出版。随后，就准备编撰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于是将辛亥革命全过程梳理出若干专题，按专题印制了万余张卡片，着手进行研究。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许多同行一样，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了一年。令人不无遗憾的是，从学识、精力等方面来说，这正是我能够提供若干稍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的十年。

“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政方针，把一切工作，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引上了稳步发展、日趋繁荣的境地。一九七六年冬起，我襄助章开沅同志主编《辛亥革命史》，到一九八一年得以竣事，全书达一百一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本书编撰工作的先后有三十余人。有的同志问道：“你们编写组那么多人，竟能顺利地在五年多

的期间完成这部大型专著，有什么好的经验？”我的体会是：大伙合作共事，和衷共济，不斤斤于名利，没有象《红楼梦》一书里王熙凤说的“放窝里炮”，如此而已。

近年来，我又进一步把研究范围缩小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这一课题。经过探索，我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形成、分化、特性以及它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政潮的起伏、文化思想的嬗替等等的关系，提出了看法，自认为是大体形成了一个体系。

概言之，三十岁以前，我主要是练习基本功，在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方面打好底子。随后确定研习中国近代史，由此缩小到专攻辛亥革命史，进而探索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归宿，提出了自以为颇具具体系（也许是将被人们嗤之以鼻的谬误见解）的看法。

各人情况不同，在治学道路上步法不一，我不敢自命充“人之患”，无非姑妄言之，更请读者姑妄听之。

一九八四年九月

名言录

知 识 篇

知识就是力量。

——培 根

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

——泰戈尔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知识犹如人体血液一样的宝贵。人缺少了血液，身体就要衰弱；人缺少了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邓小平同志在解放 战争中的几个侧影

· 穆明德 ·

抗战胜利后，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政委，他对刘伯承司令员十分尊重。一九四六年夏，我军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主动向陇海路出击。我陪刘司令员乘坐一辆马车，在进军河南濮阳的途中，刘司令员问我：“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辆大车？”我当时是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于是根据实际情况回答：

“我看五辆就够了。”但到了濮阳城后，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二十五辆。刘司令员在驻地看到

后，质问我：“你说只要五辆，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他在地踱了踱，来不及同邓政委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按理象军民、军政关系这类政治工作是邓政委分管的，可邓政委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因此，他主动跟大家站在一起，认真听取刘司令员的严肃批评。末了，刘司令员说：“请政委给大家讲话。”邓政委马上走上前，转身对大家说：“师长（邓小平同志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我们听惯了的人是懂得的）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几句简短的话语，寄寓了邓政委对刘司令员多少诚挚

的情感和尊敬呀！这次训话，实际上成了我军进行陇海战役的动员令。

邓小平同志不但在工作中尊重刘伯承同志，就是在他其他方面，也总是把刘伯承同志当作师长。刘司令员是文武双全的儒将，书法造诣深，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刘邓首长同寝一室。他们黎明即起，刘司令员翻译俄文军事论著，邓政委就把他的字帖、拓本拿来细心琢磨。并临摹刘司令员那运笔遒劲的手迹，诸如“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王者之师所向无敌”等等。有时，我前去欣赏，邓政委总是自豪地说：“我练的是‘刘体’，这可是集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名家各体之大成的字呀！”不久，他的字就颇接近刘司令员的翰墨了。

刘伯承同志对邓小平同志也是十分尊重的。记得一九四七年八月渡淮前夕，邓政委建议：“刘司令员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过河指挥部队，我同李达参谋长暂留下狙击追敌。”刘司令员十分赞同地说：“政委的决定就是指示，按政委说的立即行动。”话虽不多，但充分体现了领导者之间的高度信赖和团结精神。刘邓首长能数年如一日地指挥部队摧枯拉朽，百战百胜，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要亲自去过问一下”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在陇海战役中遭受重创之后，又集结整编第三、二十七、四十七等三个师以及刘汝明的地方部队十几万人向我疯狂反扑。战前，邓政委指示我到各纵队了解一下军队的纪律情况。我特意到了某纵队。这个纵队是原中央红军和一一五师的老班底组成的。因此，少数干部战士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认为他们过去是朱毛领导的，一贯正确，而看不起其他纵队，纵队民运部长向我反映：该部一些战士在宿营

地的果园中摘吃老百姓的果子，群众对此有些意见。个别战士还拒不接受批评，说什么“我们打了胜仗，口渴了，吃几个果子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一情况立即向邓政委作了汇报。他听了很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典型你抓得好，抓得及时，我要亲自去过问一下。整顿纪律，事关重大，就要有魄力，不然就打不了胜仗。”

到了营地，邓政委下令集合营以上干部训话。一百多人很快到齐了，大家面有疑云，不知政委为啥战前突然召集会议。邓政委立即登上一个土堆，用宏亮的嗓音严肃认真地说道：“你们是中央红军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班底，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过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革命是有功的。这无疑是你们的光荣，但决不是你们居功自傲，违背军纪的本钱，谁要损坏自己的荣誉，谁就是给毛主席、朱总司令抹黑！听说有些战士随便摘吃群众的果子，这不是违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还记不记得？这种行为是破坏军民关系，也是损害你们自己的名誉，你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邓政委有力的批评，斩钉截铁，字字千钧，顿时说得大家无地自容。纵队司令员立刻跑出来对部下说道：“我完全同意政委的严肃批评，你们大家如果还要我继续当司令员，那你们就回去教育战士改正错误，不然，我这个司令员就不当了！”结果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改正！”洪亮的声音顿时回响在营地上空，邓政委这才露出了微笑。

紧接着，邓政委又要我和保卫部副部长刘秉琳连夜到其他纵队传达他的讲话精神，征求各纵队负责人的意见，并着重要我们转告他们：“要加强纪律，否则就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就不能打胜仗，开辟新区，那样我们就只有背着背包再回到太行山去打游击。”当时，正值雨季，路滑难走，又有众敌在围追我军，邓政委派我们下去传达他和刘司令员的指示，可见他们把

军纪看得多么重要！这次整顿大见成效，我军又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在大杨湖战斗中，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还生俘了敌军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

“到南岸好好休息一下”

一九四七年八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正挥戈南征，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刘邓首长将野战军直属机关和预计到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及一部分队伍编成直属纵队，指定李达参谋长兼司令员，郭天鸣副参谋长兼副司令员。但因刘邓李郭首长须率六纵队先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汝河以南的彭店，去指挥整个中原战场，所以，邓政委决定选一名政委在河北负责直属纵队强渡汝河的具体工作。于是立即召集各部负责人紧急会议，邓政委点燃一支香烟，问大家道：“你们认为直属纵队需不需要一位政委？”“需要！”大家回答。

“好！那我就推荐一位，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以后就服从他的指挥。”邓政委略停片刻，继续说道：“我就推荐民运部长魏明德同志，怎么样？”说罢，邓政委环视了每一位同志。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知道，邓政委这次是有意要我担当这一重任的。我受命后，立即组织队伍作渡河准备。

黄昏前，已渡过汝河的刘邓首长派参谋送给我们一封信，我一看那熟悉的字迹，就知道是邓政委亲笔写的：“形势十分严峻危急，我们已打开突破口，桥头的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了。你们务必要紧急动员，文件能带过来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的就销毁，人尽量都带过来。请你们作出最大的努力，预定集结地点彭店——彭店见。”邓政委的信真是“及时雨”，读后，我们力量和信心顿时倍增。我们一面布置过河行动，一面组织一个自行车队在浮桥头鼓励大家奋勇前进。经过强渡，部队全部胜利地到达了汝河南岸。

紧接着是抢渡淮河，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天险。部队到达彭店同刘邓首长汇合后，已是凌晨两三点了。我因六天六夜没有合眼，饿困交加，正准备躺一会儿，突然一个参谋来叫我：“三排长（我的代号），三号（邓政委的代号）叫你去一下。”我明白，邓政委半夜找我，一定是有新的紧急任务。到了邓政委住所，只见他正在马灯下写东西，左手还夹着一支燃了大半截的香烟。我无力地喊了报告，邓政委连忙招呼我坐在一个土堆墩上，并递过两个馒头。我一边吃，一边听邓政委下达任务：“队伍都过来了，你也确实辛苦了，可现在还不能休息，你得立即去淮河集中一批民船，争取明天下午过淮河。不然是会要影响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的。”

“请政委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往河边布置找船任务，当时民船几乎被敌人全部劫走，到次日中午好不容易找到十来条船只。这时，邓政委来了，我汇报后，他满意地对我说：“好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这回你可先过，到南岸好好休息一下。”

过了河，到了宿营地，我就一觉睡死了。翌晨，部队出发时，由于政治部尚不知道我已回来，因此没有叫我。邓政委发现后就质问总务处长：“赖明德同志到哪去了？”总务处长说不知道。邓政委马上批评他说：“他已经过来了。怎么？你们过了河，就忘了找船人啊？快去把他找回来。”

同志们后来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内心十分感动。邓政委不但注意培养锻炼干部，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而且还十分关心爱护干部，这正是一个领导者最可宝贵的品质。

“这事的责任在我身上”

部队跃进大别山是为了开辟和恢复根据地。当时，邓政委对我说：“现在我们尚未与大别山地下县委书记刘名榜同志取

得联系，决定由你兼任经扶①县委书记和县长，待找到刘名榜同志后，就让他担任县长，你只兼县委书记。”

“政委信任我，我一定干好。只是我对地方工作尚无经验，还请政委多指示。”我诚恳地回答。

“好！我们今后多联系。”邓政委也诚恳地回答道。

到达经扶县城后，我立即以县长名义张贴安民布告。当地群众中有从延安复员回家的干部，他们认识我，主动找我联系并介绍情况，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找到了地下县委，同刘名榜同志取得了联系。由于经扶县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局面很快打开了，建立了区乡政权，扩充了游击队，广大群众也欢欣鼓舞，积极支持我们组织民兵，保卫新生政权，当然，敌人对此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武汉《大刚报》发表消息称刘伯承派他的亲信穰明德出任经扶县长，还扬言要以重金悬赏我的首级。这些颠覆活动都被我们一一粉碎了，不过，我们在对敌斗争的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当时，我在一个地主家里找到一架破收音机，修理后居然能收到好几个电台。这话匣子直接给我们传来了延安党中央的声音。一次我听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召开的农代会上说：在解放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我把这个口号向群众传达了。结果一些同志感情用事，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政策，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人，混淆了敌我矛盾的界限，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后来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口号。我也主动写了一份检查，请求上级给予处分。不久，邓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来新县检查工作，我在汇报情况时，把检查交给了邓政委。他

①国民党将领刘峙号经扶，他赶走了红军一个主力部队后，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解放后，我军一些同志建议改称伯承县，刘司令员坚决不同意，说“经扶刚解放，就叫新县好。”故易名新县至今。

看了看就退给我说：“你认识了，总结了经验，就可以了，这事的责任在我身上，我已向中央写了检查。你在新县的工作总的说是很有成绩的。”

我边听边记，邓政委见我用的是一支破旧的钢笔，就顺手拿过去看了看，然后说：“这笔太破了，不能用。”说罢就扔到一边，再把他自己的那支美国派克笔取下递给我：“这支笔我送给你了，但可不是要你写检讨的呀！”我高兴地接过笔，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这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邓政委主动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真是虚怀若谷呀！



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路线，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学习，要努力。

——刘少奇
